

党领导下的图书情报事业：追溯与思考^{*}

■ 李猛力¹ 初景利^{1,2} 李楠^{1,2}

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²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北京 100190

摘 要：[目的/意义]回顾党领导下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历程，追溯图书情报事业的奋斗足迹，总结党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方法/过程]通过查阅文献、史料，调取档案，对当事人进行访谈，记叙党领导下的图书情报事业的历史沿革。[结果/结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与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党的领导是图情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新时代要加强党对图书情报事业的全面领导。

关键词：党的领导 图书情报事业 发展历程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18.001

经过 100 多年的奋斗，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取得诸多进展与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历史变迁与实践探索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没有党的政策的指导与制度设计，就没有图情事业的今天。图情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进步、重大发展阶段，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结果。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对政策、战略与发展方向的把握，才会有图情人的努力奋斗和价值贡献。图情事业的发展，就是党领导下的图情人不断奋斗、创新开拓的过程。党的领导是图情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本文回顾了党领导下的百余年来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图书情报事业初创期（1921 - 1949）、图书情报事业艰难探索期（1950 - 1977）、图书情报事业快速发展期（1978 - 1999）、图书情报事业蓬勃发展期（2000 至今）四个阶段进行论述。

1 基本概念与文献综述

本文中的“党”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党领导下”指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做的有关图情发展的讲话或

论述；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图情事业的法规、政策；党和政府召开的有关图情的重要会议；党和政府所建立的有关图情组织机构等。

自 1921 年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就成为图情事业发展的主体推动力量，多年来也有诸多的相关研究。曹淑霞梳理了毛泽东的图书馆情节^[1]；许平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图书馆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义^[2]；钟懿琼简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高校图书馆建设之间的关系^[3]；杨勇指出了科学发展观对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指导作用^[4]；方家忠阐明了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图书馆界需要明确新的基本发展思路^[5]；黄宗忠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30 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主要成就、经验与教训^[6]；栗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图书馆在服务社会方面经历政治化、经济化、数字化、智慧化四个阶段^[7]；饶权总结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8]；龚蛟腾阐述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探索与迷茫中的变革、发展与反复^[9]；江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关系^[10]；周云峰等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探究了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图

作者简介：李猛力，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初景利，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岗位教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博士，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E-mail: chujl@mail.las.ac.cn；李楠，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办公室党建及宣传主管，六级职员，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2-08-26 本文起止页码：3-10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书馆事业的指导^[11]。不少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在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内论述党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领导,部分学者阐述了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图书馆事业的指导与影响,也有学者梳理总结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但较少有学者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为背景,系统追溯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脉络,也缺少党的领导对图情事业发展的影响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系统回顾并总结党对图情事业百余年来发展的领导与支持意义重大。

2 党领导下图情事业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余年历史,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主要的历史时期^[12]。党领导图书情报事业不断开拓创新,没有党的政策的指导与制度的设计,也就没有图书情报事业的今天,图书情报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数据资源日臻丰富,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技术手段不断完善,服务效果显著提升,学科发展不断进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模式,整体经历了初创、艰难探索、快速发展、蓬勃发展四个阶段。

2.1 图情事业初创时期(1921—1949)

100多年前,中国经历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仁人志士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新思想的前沿阵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正是在图书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创党的思想,孕育建党的纲领,图书馆成为启蒙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2.1.1 毛泽东、李大钊与图书馆

毛泽东与图书馆渊源颇深。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13]。学校新设了藏书楼,里面收藏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图书馆的开始。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3]。学校课程有限,加上校规刻板,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图书馆去看书。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熊光楚等24名青年联袂北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毛泽东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主任

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成为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他利用北大图书馆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与易礼容、彭璜等人发起创办了“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的长沙文化书社,对于湖南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都起了重要作用^[14]。文化书社采用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方式经营运作,既出售书籍,又设有阅览所。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不久,与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5]。自修大学以自学方式为主,所以极为重视图书馆的建设。1922年,毛泽东又在长沙都正街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16]。

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元月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教授^[17]。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年会商的演说中,李大钊提出: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依赖图书馆不可^[18]。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经过前期辩论之后,在北大图书馆的一间屋子内策划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团体。10月,李大钊在此发起成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李大钊帮助在北大图书馆藏书室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馆,这是我国最早的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馆。

2.1.2 启发民智的上海通信图书馆

1921年5月1日应修人等人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恽代英、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是其会员。上海通信图书馆为劳动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认为“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有产者阶级”“咱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使爱读书者有得书读,努力使不十分爱读书者变成十分爱读,努力使不爱读书者变成一分一分爱读,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咱们义不容辞的,并且这些工作也不是枝节的,也不是与革命绝不生关联的”^[19]。他们在图书馆创立宣言中明确指出,要使图书馆“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成为大规模上海图书馆的先导”。而之所以采取通信邮借的方式,就是要“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20]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该馆成立了中国

共青团支部。同年,应修人等几位办馆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该馆的活动即在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1929年5月,上海通信图书馆被查封^[21]。

2.1.3 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的工作

1937年4月,陕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各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提出“将在各市镇设置图书馆、阅报室”^[22]。1938年,边区教育厅《社会教育纲要》中,将图书馆工作列入社会教育“文化工作”范围^[22],该文件是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工作最早的、最系统的一个指导性文献^[23]。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要求“在每县的中心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

1941年7月20日,延安图书馆界主要负责人发起成立了延安图书馆协会^[22],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图书馆学术组织,是延安地区图书馆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研究改进图书馆工作、开展图书馆协作的业务组织。

2.1.4 随军书店-图书馆

“随军书店-图书馆”全称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随军书店-图书馆”,其前身是山东新华书店随军书店(以下简称“随军书店-图书馆”),始建于1947年4月。为了使华东军队在艰苦作战的同时可以加强文化学习,提高军队的综合素质和作战能力,华东野战军向山东新华书店提出“成立随军书店”的要求^[24]。1949年11月,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党全军转发第三野战军的做法,高度赞扬第三野战军设立“随军书店-图书馆”的创举,并对山东新华书店的宣传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951年4月,鉴于解放以后书店已经遍布城乡,部队建立书店已无必要,决定撤销“随军书店-图书馆”,将遍布陆海空三军、后勤部门和军政学校的31家“随军书店-图书馆”全部改为部队图书馆^[24]。

2.2 图情事业艰难探索期(1950-1977)

建国初期,图书馆的主要职能为服务国家的思想宣传工作,根据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图书馆与各种书刊代售代订处、书亭、书摊和流动书刊供应组织一样,是国家书刊发行工作的重要载体。随后的1951年2月25日,国家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使图书馆的职能在宣传属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属性,图书馆在国家民生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升。到1955年,随着文化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图书馆

的建制化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为承接更多的功能与职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25]。到1956年2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图书馆在宣传属性、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更为专业化的科学属性,即要迅速地建立科学情报工作,并要求研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并批判性地吸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路径依据。为解决图书馆经费不足、人才队伍匮乏、办公场所紧缺等问题,中央在追加图书馆预算经费的基础上,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高等教育部,1956年12月),至此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上行通道。1957年6月,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聂荣臻确定了全国中心图书馆的发展思路,即将全国有限、分散的图情资源进行集中收储与协同,率先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组织中心图书馆,为全国科学工作者服务,并负责指导和帮助其他图书馆的工作。同时肯定了中国科学院1956年成立的科学情报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工作成果,并做出了扩大出版规模、关注全球科学动向以及加强科学情报研究的重要指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促成了“全国图书馆协调组”的成立,并在同年推动了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和《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的出台,确定了成立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制全国联合目录、报道国内外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动向等三项主要工作任务^[26],图书馆的目标更加清晰,资源利用效率更加充分,社会作用显著增强。

建国早期,中国科学院与文化部、高等教育部均为国内建制化较为完善的图书馆系统,并在图书馆办馆制度与建设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

(1)在建制模式与治理方面,1954年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暂行组织规程》出台,规定京区研究所及地方分馆实施垂直一体化的两级管理模式;并前后于1953年、1955年、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分馆、兰州分馆和武汉分馆,于1958年成立了四川分馆(1962年变更为西南分院图书馆)。

(2)在办馆思路方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图书馆首任馆长陶孟和于1956年7月22日在《人民日报》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价值主张,即图书馆要为科学家和

科学研究服务,依靠科学家办图书馆;同时,倡导开展书刊国际交换和图书分类管理工作。

(3)在支持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方面,根据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总体目标,制订了与之匹配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未来发展远景规划,目标是在12年内发展成为一个全国科学技术文献资料中心^[27],馆藏要覆盖全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情报资源。

(4)在资源组织方面,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适用于科技界文献检索的分类方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成为中国图书馆三大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人大法》)、《科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之一,提升了科研人员查询与借阅文献资料的效率。

(5)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联合创办了中国科学情报大学,设科技情报系、编译出版系和图书馆学系,后于1959年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情报系^[28]。

(6)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为新中国专利文献工作的发源地(1959年),由最初收藏有21个国家的130多万件专利,发展到1965年移交全部成果时的24个国家的上千万件专利说明书和配套的26个国家的各种检索工具书。

(7)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传播方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于1956年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先后更名为《图书馆工作》和《图书情报工作》^[29],成为新中国首个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为国内图书馆学思想碰撞、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

“文革”时期,全国图书馆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业务萎缩、队伍离散、系统整体处于基本停滞状态^[30]。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也因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对党的热爱和对图书馆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业务工作没有完全中断,仍然坚持书刊订购,基本保证了外文期刊订购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服务部门坚持开馆接待读者,赢得了广大科学家的拥护,为中国科技事业在改革后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还根据国家战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了专项的文献信息服务,如为总参提供有关珍宝岛的7种信息资料,组织翻译出版《进化论与伦理学》和《用微生物从石油、天然气和煤中提取蛋白》译

文集,参与进行棉粮油接收技术的文献调查、唐山地震后组织人力编印有关地震资料以及编印《国外科学导报》等。

2.3 图情事业快速发展期(1978-1999)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中国科学思想得到了一次深度解放,科技事业开始走向繁荣^[31]。图情事业伴随着“科学春天”的脚步得到了一次史诗级的升华。各大部委在这一时期密集出台与图书情报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极大促进中国图情事业的高速发展。与促进图情事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与制度如:《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0)、《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1)、《高等学校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人员守则》(1982)、《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1987)、《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1987)、《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暂行条例》(1987)等;与推动图书馆某项工作或地方图书馆发展工作相关的主要政策与制度如:《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1978)、《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1982);与图情工作人员激励机制相关的政策与办法如:《试行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和图书资料情报人员职务名称确定与提升的两个暂行规定》(1979)、《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1981)、《图书、资料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1986);与图情学科和专业化建设相关的政策与规划如:《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1978)、《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1978)、《图书馆学学科中长期规划》(1983)、《关于发展和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几点意见》(1983)、《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事业“七五”规划》(1987)。此外,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均布局了加强图情事业的重要举措,为中国的图情事业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国家“六五”计划提出了图书馆物理环境改善,国家“七五”计划提出了图情工作要融入祖国现代化建设,国家“八五”计划提出了要增强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和档案工作的扶持力度,国家“九五”计划提出了图情工作要与信息化技术手段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与图情相关政策、制度密集出台的双重加持下,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结构性改革:①按照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精神,1978年12月提出中国科学院实行“图书情报一体化”体制,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一部分”定位,即

“科技图书情报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图书情报业务人员是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部分”, 确立了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27]。②先于国家于 1979 年 8 月出台试行《中国科学院图书、资料、情报人员定职升职暂行办法》, 激发了中国科学院图情人员专业干劲, 并为国家在图情专业干部职称认定方面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③适应国家战略规划需求, 根据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人大常委会和院有关主管机关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提供美、英、苏、日、法等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立法资料等情报; 同时,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创办和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学科情报学刊物。④1978 年,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牵头成立了院京区图书情报自动化系统筹备组, 开始研究图书情报自动化和计算机发展规划问题, 成为国内图书馆界最早应用计算机的单位之一^[32]。⑤1979 年 8 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联合培育图情学科研究生的工作^[33], 一批图情领域拥有交叉学科背景的专业化人才开始涌现。⑥1981 年 2 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图联, 英文缩写为“IFLA”)的机构会员, 至此在国际上打开了图情业务与学术交流的新局面。⑦1985 年 11 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保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名称), 在图情学领域率先进行了精细化分工的探索, 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科学院特色的、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治理结构。

2.4 图情事业蓬勃发展期(2000 至今)

新千年后,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 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出口配额, 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与人文交流日益增多, 使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在加速, 国力进一步增强, 这也使社会矛盾从生产力之间的供需矛盾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被满足的矛盾。图书馆需要在解决这种社会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在党中央领导下, 图书馆及文化事业的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一揽子政策与法规频繁出台, 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管理暂行办法》(2002)、《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2008)、《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2010)《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2012-2013)、《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2019)、《信息与

文献 公共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方法和流程》(2019)、《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2020)、《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业务规范》(2020)等。随着公共图书馆进入法制化快车道, 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 217 个, 总流通 72 898 万人次; 全年出版各类报纸 276 亿份, 各类期刊 20 亿册, 图书 110 亿册(张), 全国人均图书拥有量为 7.76 册(张)^[34], 国人的阅读习惯、公民素养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进入 21 世纪, 中国在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过程中, 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建设的重要性。为了更多减少对技术型物资的进口依赖, 避免被他国“卡脖子”, 党中央于 2006 年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总体框架。2012 年, 党的十八大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时, 科技情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在该领域深耕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 大胆改革, 锐意进取, 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与知识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主要成就包括: ①“十五”期间完成了数字化转型, 将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建成了符合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求, 具有高效运行机制的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②为更好地发挥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整体优势, 2006 年将原来的北京、兰州、成都、武汉 4 个文献情报机构整合, 筹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并在此基础上, 2014 年通过对文献情报中心的职能调整, 使之成为具有组织、管理和协调全中科院的文献情报服务、资源保障的新型知识服务机构; ③成立学科咨询服务部, 成立学科化服务协调工作组, 提出“资源到所、服务到人”“融入一线、嵌入过程”“常下所、长下所”“责任到所、服务到所、考核到所、评价到所”等服务理念, 并付诸行动^[35]; ④邀请德国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图书馆、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等机构的国际同行专家对文献情报中心的服务概况、服务能力和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评估, 工作成效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⑤进一步扩展了职能定位, 增加院史研究与传播、科技成果展等职能, 打造升级版的国家科技知识服务体系, 培育大数据分析、知识发现、知识计算、监测预警、评估评价的智能化技术能力; ⑥作为中科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首批试点单位, 2021 年 1 月, 文献情报中心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 坚持和加强党对文献情报事业的全面领导, 党建与图书情报业务深融互促、同频共振, 拧成“一股绳”,

党建与中心业务及管理等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3 党领导下图情事业的发展思考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跌宕蔓延,中国发展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36]。站新的历史交汇点,机遇与挑战并存。图书情报事业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加快转型变革,促进党的建设与图书情报工作深度融合,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1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图书情报事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7]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形成了从理论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生整体性、格局性、历史性深刻变化。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政治保障,必须长期坚持。党是领导图书情报事业的核心力量,正是在党的组织引领、战略部署、发展规划、路径选择等全面、系统的领导与支持下,图书情报事业才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3.2 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从传统图书馆到知识服务机构的转型变革

党领导下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历程,也是图书情报事业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也必然进入新时代。图书馆主要矛盾已由用户的文献需求与图书馆的资源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用户对图书馆新型服务的需求与图书馆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38]。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资源的广泛聚集,科学研究正在朝着为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时代”演变^[39]。这种变化加速颠覆传统文献情报工作范式,科技情报愈加重视基于数据的循证分析,并以数据驱动、智慧赋能提高研究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2021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章,提出“整合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和“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四项任务^[40]。在“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一章,提出“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包括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等。蓝图已经擘画,图书馆需要加快转型变革,提升新型服务能力,培养专家型馆员,重新布局和构建包括知识组织、嵌入式服务、知识咨询、数据管理与服务、情报研究与分析、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泛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出版(library publishing)与出版服务、智库研究与服务、智能图书馆与智慧服务在内的新型能力体系^[41]。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图书情报事业要在党的领导下持续深化改革,以改革应对变化、以创新回应挑战,更加全面、系统、精准、及时、有力地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

3.3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将党的建设与图书情报工作拧成“一股绳”

2020年10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印发《关于破解“两张皮”问题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意见》,为各单位提高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图书情报工作实践中,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为导向,找准科技创新要素和党组织的优势之间的逻辑关联,聚焦解决制约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把政治要求和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图书情报事业创新发展全过程。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充分发挥“两个作用”,深刻把握要求,上下联动,促进“双融合”,拧成“一股绳”,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支撑科技创新、推动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能力。要发挥“两个作用”,打造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完善推动党建和图情工作的融合与互促机制,坚持自立自强,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建设科技强国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信息支撑。

4 结语

建党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图书情报事业不断自我突破、深化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时代中国图情事业的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图情事

业发展规律,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需求同频共振。图情事业一定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致谢:感谢任娇蕊博士生在论文资料收集中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参考文献:

[1] 曹淑霞. 毛泽东的图书馆情结[J]. 党史博览, 2020(11): 19-23.

[2] 许平. 试论邓小平理论对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意义[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6): 84-87.

[3] 钟懿琼. “三个代表”思想与高校图书馆建设[J]. 图书馆论坛, 2003(5): 129-130.

[4] 杨勇. 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图书馆[J]. 图书馆论坛, 2005(4): 39-40, 66.

[5] 方家忠. 新时期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路径与全行业参与[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9(5): 71-79.

[6] 黄宗忠.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5): 68-76.

[7] 栗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展望[J]. 图书馆, 2020(6): 10-15.

[8] 饶权.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经验与转型发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5): 15-26.

[9] 龚蛟腾. 新中国三十年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与迷茫[J]. 图书馆, 2013(5): 29-33.

[10] 江峰. 中国共产党和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J]. 才智, 2012(19): 195-196.

[11] 周云峰, 刘琼, 刘桂锋, 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图书馆事业[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2, 4(1): 3-20.

[12] 曲青山.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 光明日报, 2021-02-03(11).

[13] 毛泽东是如何走上建党道路的[EB/OL]. [2020-07-14].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714/c85037-31782057>.

[14] 曾祥虎. 毛泽东与文化书社[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994(6): 5.

[15] 曾小敏. 毛泽东与湖南自修大学[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1(2): 23-26.

[16] 白杉, 子荫. 毛泽东与图书馆[J]. 党史文苑, 2003(5): 22-24.

[17] 苗春德. 论李大钊的教育思想[J]. 史学月刊, 1987(2): 65-71.

[18] 常进军, 李继华. 李大钊的教育现代化思想——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12): 87-89.

[19] 李朝先, 段克强. 中国图书馆史[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2: 290-295, 334, 337.

[20] 郑爽. 会员制模式在民国私立图书馆的运用——以上海通信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研究, 2022(5): 19-27.

[21] 刘聪. 应修人与上海通信图书馆[J]. 时代教育, 2015(5): 164.

[22] 赖伯年, 田林艳, 任成录, 等.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纪事(上)[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8(1): 50-51.

[23] 申晓娟. 从藏书楼到近代公共图书馆: 1949年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政策发展分析[J]. 图书馆建设, 2014(4): 76-84.

[24] 邵颖超, 马静. 解放战争时期“随军书店-图书馆”的模式、特征及其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3): 90-96.

[25] 李超平. 中国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 19-24, 89.

[26] 张树华, 赵华英.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次浪潮——记“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及其协作、协调活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 35(3): 21-26.

[27] 白国应.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50年[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4): 5-10.

[28] 孟广均, 初景利. 中国科学情报大学的创建与沿革[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8): 3-11.

[29] 《图书情报工作》50周年[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8): 13-19.

[30] 范兴坤.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回顾[J]. 图书与情报, 2009(1): 1-9, 27.

[31] 何祚麻.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4): 409-415.

[32] 郑建明, 范兴坤. 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技术现代化政策思路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09(5): 32-38.

[33] 陈传夫, 陈一, 司莉, 等. 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授权“四个十年”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1): 17-28.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 中国统计, 2022(3): 9-26.

[35] 初景利, 孔青青, 栾冠楠. 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22): 11-17.

[36] 世界百年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作为[EB/OL]. [2022-03-28] 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2-03/28/content_78133565.shtml.

[3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38] 初景利, 高春玲. 新时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重新认识——兼论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原回归[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 25-31.

[39] 徐敏, 李广建. 第四范式视角下情报研究的展望[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2): 7-11.

[40] 王扬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科学院[N]. 中国科学报, 2021-06-29.

[41] 王宇, 谢朝颖, 初景利. 学术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十大关键问题[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24): 5-13.

作者贡献说明:

李猛力: 提出论文选题, 审定框架, 审定主体内容;
初景利: 提出论文框架, 设计主体内容, 论文修改;
李楠: 收集梳理资料, 撰写论文初稿。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Mengli¹ Chu Jingli^{1,2} Li Nan^{1,2}

¹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²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rting out the struggle footprint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and summarizing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y consulting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ng archives, interviewing the parties, tracing and narrat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ult/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has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the busines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图书情报工作》2022 年重点选题指南

1.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图情档研究的作用与能力
2.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看新
3. 开放科学环境下科学交流范式的新变革
4. 后疫情时代学术信息交流模式的变化与影响
5. 新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内涵与理论体系构建
6. 新文科建设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战略规划
7. 科技竞争背景下国家文献资源保障策略研究
8. 全媒体数字资源中心的设计与研究
9. 政府数字资源管理与长期保存
10. 政府开放数据管理与隐私保护
11. 开放科学数据、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12. 数字经济中的数据功能及作用机制
13. 面向深度知识服务的拓展型信息资源标准与规范研究
14. 基于数据挖掘的文献资源智能采选推荐算法研究
15. 面向高价值专利培育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16. 面向交叉学科的跨学科知识组织方法与实践研究
17. 国内外情报工作制度演变与我国情报工作制度创新
18. 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情报学理论方法
19. 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情报监测与识别理论与方法
20. 聚焦创新驱动的核心关键领域情报分析服务研究
21. 面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安全情报研究
22. 中美科技对抗下国家情报战略研究
23. 智能情报与数据智能研究
24. 国家总体安全观下应急管理信息服务及情报体系
25. 重大突发事件下应急情报协同与舆情引导
26. 高校图书馆在履行高校五大基本职能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27. 智慧图书馆研究与应用实践创新
28. 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评价
29. 图书馆大安全管理与应急服务
30. 国际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发展趋势研究
31. 图书馆多源数据融合及治理
32. 图书馆小数据与暗数据的价值评估与应用研究
33. 教育新基建与图书馆建设
34. 图情档机构重组与队伍的专业化研究
35. 图书馆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36. 健康信息学的理论与方法
37. 健康信息行为和个人健康信息管理
38. 虚假健康信息治理
39. 风险信息的识别、监测与传播
40. 区块链与信息安全问题
41. 面向全民全社会的数字素养能力与数字素养教育
4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43. “元宇宙”场域下图情档学科的研究课题设置
44. 文旅融合背景下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创新
45. 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的新发展
46. 面向文化遗产的数字人文研究
47. 少数民族文献遗产建档研究
48. 红色文献、红色档案与红色记忆研究
49. 档案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50. 档案计算学
51. 数字出版与新型出版研究
52. 学术评价改革与创新
53. 数智赋能的创新评价
54. 其他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21 年 12 月